

杨绛的文学创作道路



杨澄的文学创作道路

柳倩题



杨西北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杨骚的文学创作道路

杨西北 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闽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8.25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15—0861—1/G·184

定价:7.50 元

编 者 的 话

1992年11月26日至28日,在杨骚的故乡福建漳州市举行了杨骚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由漳州师院、漳州市政协、福建现代文学研究会、福建作家协会、广东作家协会、漳州市文联、福建华安县人民政府、福建芗城区(原漳州市)人民政府等联合举办的。

本书收入的论文绝大多数是提交给这次讨论会交流的论文。

本书的出版,得到杨骚学术讨论会发起单位的支持,得到厦门大学出版社的支持,特此致以谢忱。

目 录

编前语

杨骚和他的《乡曲》 卓如(1)

从《心曲》到《半年》

——论杨骚的诗歌创作历程 柯文溥(7)

略论杨骚的诗歌创作道路 潘颂德(25)

试论杨骚的诗歌创作道路 游友基(36)

从杨骚的诗作看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 叶瑛杰(49)

杨骚的上海十年和他的长诗《乡曲》 王惠廷(56)

试论杨骚的文学观 林松荣(66)

试论杨骚的文艺思想 陈述(77)

杨骚的文学思想 钦鸿(84)

诗人：人间的“安泰” 吴子林(91)

论杨骚作品中的感伤和愤世 朱立立(100)

论杨骚早期创作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陈一波(111)

杨骚：从低吟到呐喊 倪金华(122)

杨骚诗歌表现时代生活的独特性管见 陈天助(129)

杨骚抒情诗结构形态扫描 张向东(138)

试论杨骚诗歌的古典美和现代情 李正午、曹士全(148)

农村觉醒的热情赞歌 王耀辉(154)

南国“鹰燕”之歌

——杨骚抒情短诗一瞥 林貽荣(162)

试论杨骚的剧作 任伟光(168)

左翼戏剧初潮的一对海燕

——杨骚、白薇三十年代初戏剧代表作合论 余峥(180)

杨骚戏剧创作初探	邱煌焜(190)
杨骚与《民潮》半月刊	陈松溪、黄安榕(197)
新诗歌派与新诗歌运动	王维桢(206)

附 录

杨骚学术讨论会部分贺电、贺信(以收到的先后为序)

胡絮青、舒济、舒乙贺信·····	(230)
草明贺信·····	(231)
楼适夷贺信·····	(232)
欧阳山贺电·····	(233)
端木蕻良贺信·····	(234)
艾芜贺信·····	(235)
任钧贺信·····	(236)
于逢贺信·····	(238)
沙汀贺电·····	(239)
广东作家协会贺电·····	(240)
回忆杨骚	蔡大燮(241)
杨骚简谱(初稿)	杨西北(244)
思念的浪花(代跋)	杨西北(259)

杨骚和他的《乡曲》

卓 如

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杨骚，原名杨维铨，福建漳州人。1900年1月19日生于漳州城南市街，不满周岁，就过继给一个比较富裕的堂叔做养子。养父是个读书人，爱好诗文，有名士之风。杨骚从小就受到影响，喜欢游览山水，寻访古迹；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间传说也很有兴趣。小学毕业后，进入福建第二师范预科，后转入福建省立第八中学。

青年时代的杨骚，受到了爱国思想的陶冶，在家乡常常听人讲到台湾被割后的惨史，看到从台湾跑回来的可怜同胞，他一心想当个救国英雄，收复台湾。1918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华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补习英语、数学及理化等。那时他的志愿是学海军，预备学成归国，率领舰队打击侵略者。当时日本的海军学校进不去，他便改学矿业，想以“开矿救国”。可是准备了两年，仍然考不上理想的学校，加上身体不好，经济拮据，心情十分忧郁。这时，他认识了在日本留学的李初梨，两人情趣相投。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认为世间只有文学家的生命才长久、永存。在李初梨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外国文学作品。

1921年，杨骚考入公费的东京高等师范，但是他对功课全无兴趣，就是喜欢看小说、诗歌，有时还非常热心看歌剧本。与此同时，他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新思潮的启发，开始习作诗歌，曾寄给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几首诗后，他非常兴奋，这可以说是杨骚创作的最初起点。1923年因东京大地震，学校停学回国，次年初返回东京继续求学。同年10月写出诗剧《心曲》，表现一个青年在黑暗社会中的苦闷和对光明的追求，以及对纯洁

爱情的天真渴慕。诗句优美，抒情气氛浓郁，但写得很朦胧。这部处女作，直到1929年才由北新书局出版。

由于经济原因和对学习内容没有兴趣，不久杨骚就辍学回国。1925年夏赴新加坡，在道南小学教书，课余时常写作新诗，大多是表现不顾风浪险恶，飘洋过海，追求光明的主题。然而，“天上黑云多，地面阴影多，山里顽石多，人间苦痛多”，追求的结果只是失败、幻灭，诗人心中充满着愤慨和不平。还有一些以爱情为题材的诗篇，调子是凄苦的，思想内容较浅淡，受古典文学影响的痕迹也较明显。这个时期的诗作，后来大多收在《受难者的短曲》（1928年11月开明书店出版）中。

1927年冬，杨骚从南洋回国，专门从事创作。曾为《北新》、《奔流》、《语丝》等刊物撰稿。先后出版了剧本《迷维》、《他的天使》等。这时期写的短诗，收在《春的感伤》（1933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里。其中《把梦拂开》一诗，明显表现出愿意丢掉幻想，扫除一切陈旧的东西，赤着膊，挺着胸，光着腿，加入革命的集体，跟上呐喊击杀的兄弟，泅过血腥的大海，把彼岸的炮垒毁坏。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诗人用坚定的态度表示愿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要摧毁旧世界，换个新的、美的世界，呼出了人民的心声，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尽管诗中对革命的斗争描写不具体，对未来新世界的思想也较抽象，但就坚持革命信仰，同旧世界决裂这一点来说，也是很可贵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杨骚加入左联后，积极参加左联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1932年9月，他和左联诗歌组的蒲风、穆木天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在《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样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的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因而他们的任务是“研究诗

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①这鲜明地表示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是要扫清当时笼罩诗坛的迷雾,提倡、开展现实主义新诗歌运动,把诗歌大众化体现到创作实践中,利用民歌、时调、儿歌等形式进行诗歌创作。杨骚在这方面也作了新的尝试。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这是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的发刊诗,表明了革命诗人共同的创作主张。杨骚积极实践这一主张,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的迫切主题,努力反映时代的风貌,使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扫去了往昔诗作中的朦胧气氛和感伤情调。1934年创作、1936年修改完成的长篇叙事诗《乡曲》,堪称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他全部创作中最值得称赞的篇章。它以朴素的形式,坚实的诗句,生动地表现了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旧中国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的觉醒、斗争。诗篇通过农村妇女阿梅给城里的哥哥写信,展现了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干旱使得整个故乡田荒地荒,全村的人吃草根、树叶,走投无路,而繁重的苛捐杂税吸尽了农民的心血和骨髓。阿梅实在活不下去,要和丈夫老三一起到城里来找哥哥。而觉醒了的农民老三,当村里革命的领头人、忠厚刚毅的阿福被官兵捉去活活打死后,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毫不畏惧,东奔西走,揭露土豪劣绅勾结官兵,作威作福,压榨农民的罪恶:“他们指上闪耀的钻石是我们的汗滴;她们脸上鲜红的胭脂是我们的血液。他们吃的是我们的肉;她们穿的是我们的皮。我们终年在做活,但始终在饿……我们非捣烂吃人的他们这一窝。”点明了造成贫困的根源在于阶级剥削,表达了摧毁

① 《中国诗歌会的成立》(《文学月报》1932年10月第1卷第4期。)

这吃人制度的坚强决心。

黎明时，阿福的父亲林伯伯被迫走上死路，村里的人都异常悲痛、激愤，老三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村子骚动起来了，人群举起了锄头和铁锹：

成百整千的人头象山泉奔涌，
在那蜿蜒从村里走入镇上的路当中，
哦，这奔涌的洪水将冲破一切堤防，
哦，这巨大的流火将烧毁一切野原！

暴动的群众冲到镇上，用锄头砸开了土豪的谷仓，农民的米袋里装满了粮食：“这是饿鬼们第一次吐出的恶气，是奴隶们第一次勇敢的叛逆，哦，是饿鬼们奴隶们第一次的胜利。”作者以雄伟的气势，展现出农民反抗斗争的怒潮，粗犷的诗行中，奔腾着革命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反抗的力量。

诗的末章，作者以沉痛的笔触，揭露了敌人的狡猾和凶残。土豪伪装投降，却暗中找来保安队，包围了暴动的队伍，顿时枪声砰砰，暴动的带头人老三被打死了，反抗失败了。然而诗篇却形象地说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武装的反革命镇压不了的，血的洗礼，唤起了千百万群众的觉醒。通过暴动，阿梅的觉悟提高了，变得坚强了，她不再离开苦难的故乡，而要跟乡亲们一起，“打碎这乌黑的天地。”这钢铁般的誓言，反映了人民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在国民党反动派严酷统治的岁月里，在乌云压顶的恶劣环境中，写出这样铿锵有力的诗句，表明了作者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斗争勇气。

全诗结构完整，以事件的发展为序，分“写信”、“黎明”、“骚动”、“锄声”、“短简”五章，又以阿梅的信贯串全诗，开头和结尾两封信，清晰地反映出一个农村妇女觉醒的过程，“骚动”和“锄声”，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农村动乱的现实。诗的格调高亢，刚健有力。尽管诗句的提炼不够，诗的意境、诗的韵味较差；但同他早期的那些低吟爱情，悲叹失恋的诗作相比，确是一个新的飞跃。

杨骚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他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

“一·二八”事变时，他曾参加上海各界慰问团，到宝山路一带前线慰问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热心于救亡工作，在报纸上发表抗日救国的文章和诗篇。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时，他是宣言起草人之一，被选为常务理事，积极组织开展救亡活动。不久，组织遭到反动派的破坏。他辗转到达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他主张在抗战中，“文要成阵，诗要成营”。这诗营“只有统一的目标——抗战的大旗，只有统一的行动——拿笔杆当做枪杆用”^①。他热情地号召：

唱吧，昂然的诗人！
用你高音的喉咙，
多来一首“边区自卫军”，
唱破屈辱的和平梦！

吹吧，勇敢的喇叭手！
用你雄壮的宫商角徵羽，
多来一条“义勇军进行曲”，
吹散妥协投降的空气！

扫吧，健康的小说家！
用你无情的铁笔，
多来一篇“华北烽火”，
扫荡敌人的兽迹！

演吧，团结的剧人！
用你钢般的阵容，
多来一出“战斗”，

① 杨骚：《诗营随笔》（《抗战文艺》1939年10月11日第4卷第5、6期合刊）

演出我们的“民族光荣！”^①

他认为“文学是武器”，要让每个字都变成手榴弹，每杆笔都成为重机枪、高射炮。作家的心血应流在后方前方，诗人的呐喊要震动东洋西洋。1939年，他参加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战地，到中条山、太行山一带访问，经历了六个月的战地生活，跋涉万里，不仅为以后的创作搜集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在途中和战地随时进行创作，为宣传抗日发出了战斗的呐喊。

“皖南事变”后，大批进步文化人分散到东南亚去，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杨骚先疏散到香港，后到新加坡，主编闽侨总会的机关刊物《民潮》半月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参加了新加坡文化界组织的抗日保卫新马运动。1924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他随抗日文化界撤退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岁月里，尽管他精通日语，但他不说一句日本话，没有在侵略者面前露出一丝一毫的媚骨，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1946年6月他重返新加坡，到东岭中学教书，协助编辑《大战与南侨》一书。后来担任《生活报》的代总编辑兼副社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对祖国的新生，时时表现出抑制不住的兴奋。1952年9月，他挈妻携子返回祖国，掸去身上的异乡尘土，就扑在渴望已久的祖国怀抱里，开始新的创造性的劳动。1953年杨骚到广州，参加华南的文学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曾回到福建的泉州、漳州一带农村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反映侨乡生活的作品，后因病未能如愿。他虽在病中，仍与洗东合作，写出了童话故事《苹果姑娘》，儿童独幕话剧《弟弟的“百宝箱”》。另外还在《作品》等刊物上发表短诗。1957年1月15日病逝于广州。作协广州分会的同志，举行了一个朴素庄严的仪式，把这位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安葬在广州银河公墓。

1980年于北京

① 杨骚：《莫说笔杆不如枪杆》，《抗战文艺》1939年4月10日第4卷第1期）

从《心曲》到《半年》

——论杨骚的诗歌创作历程

柯文溥

杨骚是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他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散文、小说、剧本，翻译和介绍过外国作品，但他主要是个诗人。他的创作经过了一番复杂而曲折的历程，从一个个人主义的行吟者，到走向革命，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从抒发个人伤感颓废的情绪，到愤怒地鞭笞黑暗现实，讴歌革命。他的诗和诗剧有《受难者的短曲》、《乡曲》、《春的感伤》、《心曲》、《迷途》、《记忆之都》等等。这些诗集反映了诗人思想和创作上的重大发展和转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足印。

—

不，我将张着虚无的天幕，
架着幻想的锦床，
安息我疲困的体魄，
做我渺渺的冷梦。

——《心曲》

为了探讨杨骚的诗作，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诗人从事创作前的生活经历，它曾直接影响杨骚对现实和创作的态度。

杨骚原名杨维铨，福建漳州人，1900年1月19日出生。他青年时代曾在漳州府中学堂学习。1918年他满怀着爱国热情东渡

日本留学。他曾这样回顾：“初到日本的时候，我的志望在想学海军，预备将来学成归国，率领舰队打倒日本。那时候，我的爱国心非常重，因为在我们的家乡漳州，常常可以听到台湾被割了后的惨史。”“及至晓得进海军学校无望，便改了念头想学矿，以开矿救国了”^①。可是几经波折，他最终入的是高等师范文科。

在日本留学期间，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他喜读《新青年》等刊物，并开始爱好文学，“最初顶喜欢安特列夫，后来变成喜欢王尔德这些唯美派的，到了要离开日本前夕，转成喜欢看剧本，最高兴的是霍普特曼的作品，尤其是他从自然主义转成象征主义以后的《沉钟》”^②。当时他侨居国外，身受帝国主义压迫，眼看祖国的衰萎，找不到革命的出路，“思想上带有虚无和悲观的色彩”^③。因此他从欧洲唯美派、象征派的作品里找到思想上的共鸣。他的早期创作就流露出这些作家影响的痕迹。

1924年他在东京写出处女作、诗剧《心曲》。作品中的旅人不满意丑恶黑暗的现实，徘徊于茫茫的森林里，要在“那丛细柔的露珠草中”，“张着虚无的天幕，架着幻想的锦床”，以放荡不羁的热情去追求所谓理想的人生，但在“处处尽是严霜、冷露菲菲”之中，“虚无的天幕叫暗中袭来的狂风吹到天外去了，幻想的锦床被叫背地里泛滥的洪水漂流去了”，在黑暗丑恶的现实里，旅人美妙的幻梦自然得不到实现。

这部诗剧反映了作者对人生与现实的态度。五四时期，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和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坚决勇敢地置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里，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现实沉重的压抑下，既不满现状，又找不到前进的道路，追求和失望交织在一起，陷于苦闷彷徨之中。《心曲》中的旅人“俯仰

① 《急就篇·我与文学》1937年，上海引擎出版社

② 《急就篇·我与文学》1937年，上海引擎出版社

③ 《自传》，转引自洪道《悼念杨骚》，刊于1957年2月28日《文汇报》

徘徊，不知所之”，正是作者心境的写照，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流连于现实和空想之间的知识分子的面影。正如杨骚后来对自己所作的批判：“那可以说是自己年青时做过傻梦的记录”^①。

《心曲》的某些情节、意境同霍普特曼的剧本《沉钟》(1896年)有类似之处，如旅人在森林里受绿阴精的蛊惑，同《沉钟》中的铸钟匠亨利在林中被妖妇诱惑相似；旅人在林中受森姬的启示，使我们联想起亨利在深山受女神的暗示。诗剧笼罩着一层神秘阴冷的色彩，显然是受霍普特曼等象征派的影响。但在诗的形象和语言上，杨骚还是从我国古典诗词和古代民歌中吸取养分，如旅人在林中的咏唱：

欢叹的泪珠流不尽，
流不尽，不尽地流，
流成一条河水绿悠悠，
悠悠河水起微波，
微波低低愁诉莫时休，
我似风而转，
我似水而流，
千里远，万里悠，
万万里远而悠。

诗人采用重复辞句反复咏叹，具有民族诗歌的传统特点。诗剧中语言虽留有旧诗词的痕迹，但不同于五四时期胡适派那样拖着旧诗词尾巴的新诗，诗人有意吸取我国古典诗词、民歌的特点，既有一定的韵律又趋向自由变化，笔调清新，和谐华美。整部诗剧构思精巧，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

1924年3月，杨骚从海外回到漳州，由于失业，次年只得“零丁扑朔飘落在海外”。诗集《受难者的短曲》中大部分的作品是他于1926年——1927年流浪于星州一带所写的。诗人身受异族的压迫

① 《记忆之都·序》1937年商务书馆版

和社会的冷遇，对故国和家园充满了热爱和眷恋，如《归途》，表现了海外游子对荒芜的田园发出“胡不归”的慨叹和忧愤，牵动我们热爱乡土的情思，诗人这样歌唱：

哦！弟弟，娘，我将回家去，
与乡姑里妇们亲近；
我将帮她们起火烟，在日黄昏，
我将同她们上田岸，在天黎明。
哦！弟弟，娘，我将回家去，
收拾我从前弃了的小屋；
耕作我从前不要了的田园，
哦！我将做个顺从的青少年。

也有一些诗篇抒发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追求，如《自杀未遂犯》、《诱惑》，诗人对“灰色的都市”、“丑恶的人间”“暴兵虐杀”、“奸绅陷害”的社会现实发出颤响，表现了思乡爱国情绪，但大都充满抑郁悲凉乃至凄怆的情调。诗人面对黑暗现实，无能为力，只好对渺茫人生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悲伤、失望、惆怅构成诗集的主调，不少篇章散发出与时代精神相悖的虚无颓废的情调，他高举白兰地狂呼：“醉吧，一切尽在此杯中”（《酒杯中的幻影》）；他让伤感的心灵在提琴上“遗下痛的哀音”（《头发与提琴》）。诗人逃避现实的态度，更集中表现在《受难者短曲》中。诗中“西沉的落日”、“一湖死水”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在这册诗集中，我们除了听到诗人由于爱国热情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发出微弱的呼声外，更多的是抒写幻灭的眼泪，病态的心理，性的刺激和追求。诗人捕捉一些浸透了孤寂和伤感的形象，醉心于用梦幻编造的空想世界，流露出浓烈颓废感伤的情绪。华丽纤柔的词藻，撩人心弦的抒情，交融于一幅幅异域风情画中。

由于思想消沉，生活空虚，诗人多偏于艺术上的琢磨，诗风趋于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诗中多用隐喻，重视感觉，讲究官能刺激，追求虚无飘渺的意境，描绘梦幻的主观世界。诗篇虽然吸收了中国

古典诗词的特点，但也渗透了不少欧化的语言，形象和意境都显得朦胧晦涩。

从《心曲》到《受难者的短曲》，大致刻划了诗人从幻想到失望的过程。如果说《心曲》还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探索，那么，《受难者的短曲》则是探索失败后感伤的低吟；如果《心曲》多少还带有一些高亢的浪漫情调，那么《受难者的短曲》剩下的只是怅惘的哀诉和慨叹。这种思想感情显然是和时代不相协调的。当然这和作者长期远离祖国，忘情于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其世界观中落后的一面所支配。

二

“我已丢掉了童稚的梦热的易破的爱情，
我已在追求坚牢着实的快乐的人生，
使感伤的眼泪化为腥红的热血罢，
让灰色的悲痛永远脱离我改造了的心。”

——《最后的心》

杨骚毕竟是个富有爱国热情的诗人，他不可能永远沉溺于个人主义的感伤行吟里。不久，他发现远离祖国的错误，1927年底，终于归回上海。

由于诗人长期侨居海外，脱离了祖国的现实，表现了孤寂苦闷的情绪，这时他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亲睹了国内斗争的现实，思想大为振奋，他曾怀着愧疚的心情，向他的爱人、女作家白薇谈自己的创作：“我近来很想写作一点东西，但我晓得写作出来的一定还是那么一套，自己表现，身边琐事。因此，总踌躇不敢下笔。你是比我前进多了，你努力在追赶，眼睛早在注意时代的前面，总是要抓